

今日评论·一·V. 1, no. 1 (民国28年[1939]1月)~V. 5,
no. 14 (民国30年[1941]4月)·一昆明: 今日评论社
[发行者], 民国28年[1939]~民国30年[1941].

114no.; 25cm.

周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V. 5, no. 14 (1939, 1~1941, 4)

今日評論

第一卷
合訂本

今日評論

第一卷分類總目（第一期至第廿一期）

次	目
一、	國際
二、	政治
三、	經濟
四、	社會
五、	教育
六、	語言
七、	文藝
八、	通訊

一、國際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王化成	國際聯盟援華制日	六	四
王迅申	敵國內政外交的動向	廿三	三
	日本外交政策的檢討	三	八
	關於「新東亞秩序」敵國輿論的一瞥	十一	六
	最近日本對華政策的動向	十七	三
	最近歐洲疆界問題	十八	三
	美國中立法問題	廿五	五
	法西斯國家的威脅	廿八	三
	論美國對日報復問題	九	八
	法國的遠東外交	二	八
	美國新中立法案與中立問題	十九	五
	日本爲什麼不參加德意同盟	廿五	八
	遠東之國際秩序	一	八
	美國中立與遠東政策	六	八
	英美對日採取經濟報復之希望	三	六
	德國勢力澎漲後之歐洲局勢	二十	四
	希特勒與世界和平	十四	五
	英美法制日助我之最近形勢	五	八
	捷克滅亡後的歐局	十五	五
	鐵路集團與防侵略集團	十六	三

二、政治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燕樹棠	國際現勢與中國	八	三
羅文幹	世界大戰與中國	十四	三
王維恩	所望於國民參政會者	一	三
	政治統一的基礎——工業化	十	三
	法治民治與統一	十六	六
	財權與政權	廿二	三
	歷史上的——個教訓	廿四	三
史國綱	論專家行政	十六	三
朱履歐	論促進地方自治應自城市始	廿二	八
呂學海	司法制度與司法制度人才問題	二十	三
吳醉秋	中央與地方	九	三
君衡	抗戰建國與地方自治	十五	六
徐義生	省制改革之一端	二	六
陳之邁	自信的根據	八	六
張企泰	審級制度改革問題	十二	七
張佛泉	論政治之制度化	十九	四
傅孟真	政治之機構化	五	三
趙鳳階	省市參政會的成立問題	十三	七
蔡振衡	西洋法律的輸入	十	八
錢一真	民治與吏治制度	廿二	六
錢清康	略評公務員服務規程	廿八	一
錢編升	統一與一致	十五	三
	對於六中全會的金鑒	七	四
	政治的制度化	十一	三
	抗戰致勝的路徑	十一	三



魏文輝	抗戰致勝的政治	十二	五
魏文輝	幾件戰時的不急政事	十七	七
魏文輝	史治制度化	廿四	三
魏文輝	論政治建設	十九	八

三、經濟

作者	篇	期數	頁數
丁佑	雲南工業的必需條件	十二	三
王元照	困難累增的敵國經濟	十九	十
王元照	管理外匯的匯率政策問題	四	九
王元照	經濟自給與戰爭	五	五
王元照	論雲南省國地收支之劃分	十一	七
仁廣	論我國戰時及戰後的稅制	三	十
朱炳南	戰後復興政策	十八	九
李卓敏	英美借款與戰國外匯	二	六
李卓敏	民生與物價	廿五	四
吳牛農	論中國經濟的進步性	四	七
吳牛農	論游擊區及大後方的經濟建設	十六	三
吳牛農	論當前工業政策	廿三	六
周燮生	戰後之整理與建設問題	十五	三
符人	發展昆明市的財政基礎	廿一	九
陳佑孫	培植我們的經濟力	一	五
陳建業	戰時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	十三	三
陳建業	戰時西南衣料問題	廿二	九
陳碧笙	今日雲南之現金問題	二十	八
黃開祿	抗戰中華僑的捐輸	十一	十
張德昌	國家與經濟事業	七	六
劉君煊	近十年來歐洲兩極農業政策的試驗	廿四	七
劉君煊	論中國農業機械化	廿五	九
顧謙吉	戰後復興與生產建設	廿一	八

四、社會

作者	篇	期數	頁數
小可	招牌文化	十八	十
希聲	被批評	廿二	十一
吳景岩	熱烈與遲鈍	七	十
京山	荷屬華僑與抗戰	廿三	十二
林同濟	僑生與民族	廿三	九
陳雪屏	談謠言	八	八
馮友蘭	中國畢竟還是中國	十四	七
張敬	知識界婦女的自白——敬答潘光旦先生	廿一	十二
雷海宗	君子與偽君子	四	四
趙晚屏	戰時中國社會一瞥	九	五
潘光旦	抗戰收穫的一般	十五	九
潘光旦	抗戰的民族意義	二	四
潘光旦	遺傳與政治(書評)	五	十四
潘光旦	婦女與兒童	十四	八
潘光旦	演化論與幾個當代的問題	廿一	三
蕭右乾	國情普查與雲南人口的調查	六	六
蕭右乾	青年的「知」與「行」的解剖	十三	十一

五、教育

作者	篇	期數	頁數
邱椿	救救中學生	一	九
馮友蘭	論導師制	廿五	十二
鄭毅生	論教師節	五	九
潘光旦	中學課程標準問題	七	七
鄧經章	學生自治與學生自治會	十七	八
羅明甫	華僑學生與捐輸	九	九
羅明甫	職業教育	九	九

六、語言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王了一	論漢譯地名人名的標準	十一	十三
	談用字不當	十九	十一
朱自清	新語言	一	十三
呂叔湘	中國話裏的主詞及其他	十二	十
李嘉言	新文法	八	十二
陳夢家	白話文與新文學	二十	十二
聞宥	論越南語之系屬	十三	九

七、文藝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力生	大光寺	八	十
方齡貴	荒村	廿一	十三
白平階	金樓子	廿三	十三
同濟	尼采薩拉圖斯達的兩種譯本(書評)	十六	十二
吳風	週末日	八	十三
沈從文	湘西題記	二	十二
	一般或特殊	四	五
李欣	村漢	四	十三
李霖煤	西南洞天	廿四	十一
希聲	拜訪	三	十五
林蒲	尋夢	廿五	十三
周正儀	告別(獨幕劇)	十五	十三
孫毓棠	人(詩)	七	十三
柳無忌	明日的文藝	十四	十一

八、通訊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流金	夜行	五	十二
陸侃如	記安南的舊	二	十四
馮至	談讀尼采(一)	七	十一
	薩拉圖斯達的文體	廿四	九
黃賢俊	詩	十五	十四
惟一	居禮夫人小傳(譯文)	六	十三
微因	彼此	六	十
楊季康	風	十	十三
聞家駟	談許俄的一首形聲詩	九	十一
葉公超	文藝與經驗	一	十二
趙蕪菴	錦瑟解	五	十
錢穆	病與艾	三	十三
錢鐘書	冷屋隨筆之一	三	十四
	冷屋隨筆之二	六	十一
	冷屋隨筆之三	十四	三
	冷屋隨筆之四	廿二	十二
薛林	紅樓子	十七	十二
	西北小故事	四	十一
顧良	梁實秋譯莎翁戲劇印象	七	九
		十九	十三
作者	篇名	期數	頁數
仲獲	作戰的途徑(通信)	十七	十四
唐士	河北省內的抗戰概況	一	十
趙捷民	淪陷後的天津(通信)	十三	十二
編者	英美記者論歐美局勢(通信)	十一	十五

今日評論

第一卷第一期

時評

前方軍事形勢(平)

美英信用借款成立(岱)

日蘇漁業糾紛(化)

統一與一致

培植我們的經濟力

遠東之國際秩序

論導師制

河北省內的抗戰概況

文藝與經驗

新語言

錢端升

陳岱孫

張忠絨

馮友蘭

唐士

葉公超

朱自清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前方軍事形勢

一年有半的抗戰已充分使敵人失望。抗戰愈持久，敵人的失望將愈大，日非至於完全崩潰，或放棄侵略野心不可。當十月下旬廣州失陷，漢口撤退，敵人本以為可以長趨直入，一舉而通我腹地。敵軍於取得粵漢後，進兵之速，乃遠甚於陷我京滬或徐州之後。在十一月中以前敵人曾以大軍南循湘鄂鐵路，北沿粵漢路南段，合以謀湘，並溯西江以襲桂，但經我大軍迎堵，敵人的野心從未得逞。最近二旬在東江北江一帶的敵軍有集中廣州，沿湘鄂路一帶的敵軍有退守岳陽的模樣，而鄂北鄂西的敵軍亦無若何進展的可言。退兵不進的原因，有說因二月以來，東北偽軍反正者為數有十餘萬之鉅，大部且已與在熱河西部的馬占山部會合，所以湘粵的敵軍不能不撤。有說因敵人正規劃向桂省及陝西大舉進攻，以為會師西南的準備，此刻正在預備新的佈置，所以進攻之勢漸形緩和。二者以何說為準確，或是否有一準確，我們固不易說定。我們敢說的有二點。第一，最近二月來我軍在湘粵二省確實反攻堵截甚力，軍士的精神亦絕不下於粵漢未失之前。第二，中央最近對粵桂及陝的軍事有新配備，新組織，且有新戰略，中央領袖亦正在各方實地巡視指示。如果敵方以為可以乘虛攻入桂陝，那他一定又要失望的。（平）

英美信用借款成立

日來國外來訊，盛傳英美兩國已決定對我作信用的放款。美國方面，已經到了成熟的程度，數目為二千五百萬美元，由中國銀行担保，以五年為期。借款的手續，則由美國建設銀行公司准美進口銀行以這個款項購買中國的農產製成品，（據另外的消息所謂農產製成品是以桐油為大宗）而中國可以用這一筆的信用，來購買美國的汽車汽油等等物品。英國方面，在原則上，也已經成立協定。不過辦法似乎尚未

到十分具體的程度。我們只知道英國已經允許以若干信用款項，貸與中國。此項信用款項，是用在購買英國的材料，（主要是鐵路材料）及補助國內特種的建設。款項全數由英國私人方面墊付，而由商務部出口信用局予以担保。

在表面上，這兩項借款都是商業借款。牠們的用途雖然有一部分是有關軍需，如汽車汽油等等，大部分還是在普通商品上。貸款的機關也不是政府，而是私人，不過在美國，官辦的建設銀行與以核准，而在英國，商務部出口信用局予以担保。然而如果我們細攷這兩種手續的慣例，我們知道這一類的商業信用借款，與平常國際貿易的借欠有所不同。

這兩筆信用借款，在數目上，固然不算很少，不過，就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國外購買力而言，也不算很大，然而我們認為應該注意者，不在於這一次信用借款的數目，而在於借款後面的心理與態度。我們抗戰已經一年半。這是第一次我們的友國給我們一點財政上的幫助。我們也曾申訴諸國聯，我們也曾提醒九國公約諸國以條約上的責任，結果只博得口頭或紙面上的同情。國聯雖然議決請會員國自動幫助中國，其結果還是一個口惠。在我們方面，我們為民族國家的生存而奮鬥。幫助我們者，我們當然歡迎。不幫助我們者，我們也不必怨望。然而如果把眼光放大些，中日戰事，不僅是兩國間的問題，而代表世界民主和平與暴力侵略兩個勢力的鬥爭。歐美各國，經過一年半的經驗與教訓，應該知道過去怯懦的心理，不但沒有造成世界的和平，反而增長了暴力的氣燄。補救的方法，只有由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制裁一切侵略者。我們希望英美對我們的信用借款是一個覺悟的表現，是由怯懦心理變為積極心理的端倪。我們並且希望這個變換能夠與日俱長起來。（岱）

日蘇漁業糾紛

日本人在西比利亞沿海一帶捕魚的歷史很久；當東海濱省一帶，還在我們中國手裏的時候，日本人就常來打魚。我們當時對於那一帶的地方很少注意，且沒有領海權的觀念，所以很少阻止與過問。及至一八六〇年，東海濱省的地方劃讓與俄國，於是這捕魚的問題，便成爲日俄間的糾紛之一。

一九〇五年，俄國爲日本所敗。九月五日，在美國樸資茅斯締結和約。依照該約第十一條，日人取得在西比利亞沿海一帶捕魚的權利。至於詳細辦法，至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始正式成立漁業協定。樸資茅斯和約，雖然是永久的，但是根據於和約的漁業協定，都有一定的限期。每逢期滿，雙方必須重行交涉。以往這種漁業協定，已有多次，目前仍在實用的一個，係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所締結。一九二八年的協定，到一九三六年期滿。當時擬定新約，把舊約中一切辦法，延長八年，已經雙方代表簽字。不料在蘇聯還沒有正式批准這新約的時候，日德防共協定，突然發表，與日蘇邦交以重大打擊，於是蘇聯僅允將舊約延長一年。一九三七年年底，日蘇重行交涉，又無結果，只將舊約再延期一年，至本年十二月底爲止。所以兩國最近又在談判中。這是以往日蘇漁業問題的歷史。

大海公有，所以在海上捕魚，普通是沒有人能以過問。若要到外國領海裏捕魚，那就必須得當地國的允許。日本利用戰爭一時的勝利，要挾蘇聯給與在其領海中捕魚的權利。日本的漁夫，不但可以進

入蘇聯的領海捕魚，並且還可以登岸，從事於一切與捕魚有關的事業。據日人自稱，從事於這種漁業的日人，約三萬左右，每年獲利，可達五六千萬日金。從蘇聯方面看來，不能不算是一種損失。這種捕魚權，是在一個永久的和約中規定；萬一兩國之間，發生戰事，此項權利，即在取消之列。

最近談判的情形，外間還一時不易得其真像，據報載其中困難甚多。第一，日俄戰事，原因是滿洲問題而起。樸資茅斯和約會規定雙方須將駐滿洲軍隊完全撤退，只限於鐵路沿綫，每英里可駐路警十人。現在日本已將滿洲完全佔據，遠東情勢大變，樸資茅斯和約，現在是否有效，蘇聯認爲頗成問題。第二，中東路售價，至今沒有付清。日方情願考慮中東路的問題，希望蘇聯能在漁業問題上讓步。蘇聯則認爲中東路售價，與漁業協定，乃是兩件事，不能作爲交換條件。蘇方並且表示中東路問題解決後，方可談漁業協定。第三，蘇聯因軍事上的關係，要限制日人原有的漁業區域。當此日蘇關係緊張，蘇聯積極建設遠東國防的時候，這種的限制，恐怕蘇聯方面，是決不肯讓步的。本來在人家領海裏打魚，就是一件討厭的事。當初西比利亞沒還有十分開發，俄國對於遠東亦不甚重視，日俄漁業糾紛，已屢見不鮮，今後的衝突必定是有增無減。

我們很知道這個漁業糾紛，不是日蘇間主要的衝突，更不會因爲談判決裂而打仗。但是日蘇的關係已經惡劣，漁業的糾紛，如果不能順利解決，則以後的磨擦愈多，友好的關係勢將更難維持。(化)

統一與一致

錢端升

中國近四五十年來的一切運動，其中最重要的當然要推求獨立統一的運動。這是任何人所不會否認的。不但如此，求獨立統一的運動實是中心運動，其他的運動只是輔助的運動。蓋自中外發生密切的接觸以來，中國因實力後於人，而民族觀念又遠不如其他民族那樣的蓬

勃發達，至今尚未脫却滅亡的危險。所以中國數十年來一切稍具價值的運動，亦無一不以獨立生存爲直接或間接的目的。康梁的維新運動的目的，在刷新政治，以爭中國的獨立及生存。辛亥及其以前的革命運動是希望藉革命以產生比滿清較有力較有遠大眼光的政府，更藉新

政府的建立以增強中國求自存的能力。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固然是民族，民權及民生並重，但他首重之點仍為民族，且亦始終以民族的獨立生存為首要之圖。昔年胡漢民先生曾提倡所謂三民主義運轉性之說，當時頗多笑其迂者；但我們如脫離民族主義而言民權主義及民主主義，如果我們對於民權主義及民主的努力，不以取得民族獨立為目標，則該說有離題萬里之感。所以就幾種方面而言，即胡先生的連環說亦實有其至理。

一 獨立與統一不是一件事。但就過去數十年與今後某一期內的中國而言，則兩者是一而二，是不可分的。不獨立固講不到統一；不統一亦決難言獨立。惟獨立才能使統一有意義，亦惟統一才能保獨立。為民族爭生存計，惟持已有的統一，並使這統一益趨鞏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要圖，且其重要與抗日並無二致。凡是足以妨害統一的言行，當然應設法消除；凡是有裨於統一的言行，亦當然應設法倡導。

統一的重要性是無法過言的。但統一的方法則不可不出以審慎。中國近年頗有一班人熱烈地企求一致，企求人民思想一致，習俗一致，禮儀一致，各地政教一致，以及其他方面的一致。主張一致者的用心是極可佩的，他們很希望藉思想政教等的一致，以迅速達民族高度的統一。驟看起來，一致誠似統一的最好的基礎。但是一致是不是可以強求？應不應強求？如果人民思想等真歸一致，是不是民族之福？如果求一致而不得一致，又有什麼危險？凡此種種，實值得最澈底的客觀考慮。

人民習俗禮儀上的一致是比較的不重要。太不同固足以妨害民族的統一，但太相同也不免使得一個廣大民族缺乏許多有趣味而無妨統一的方面色彩。有許多方面的參差，交通便利後，一定可以漸歸消滅。另有許多方面的參差，則建築在不同的氣候地勢之上，根本無法消滅，也不應強求消滅的。更有許多習俗禮儀是根了宗教而產生的，要是許多宗教可以並立，則許多不同的習俗禮儀當然也得同時存在着。好在近年雖然也有人在提倡劃一全國習俗禮儀，這種提倡尚未成爲一種普遍風氣，所以關於強求習俗禮儀一致的危險，尚不必顯顯過慮。求宗教的一致，必發生極大的糾紛。這在歐洲各國已有過歷歷不

爽經驗。西歐各國今日之有信教自由，俱是長期紛爭及鉅大犧牲所換來的教訓。中國在國民革命成功的初年，也有一點求宗教一致（即無教）的傾向，所幸今則信教自由絕無問題，故提倡宗教一致的危險根本無須討論。

政制一致的問題。其重要性較大。中國自秦漢統一以來，在統一的時代，各等政制，除了邊疆不算外，在名義上形式上向來號稱一致；但在實際則並不一致。美國是聯邦國家但美國各邦間政治制度上的參差，實遠不及中國過去的各省。而且中國各省政府的職務，在向日既不繁複。職務既簡單，則大體上的一致，較易維持。現在各省及省以下各地政府的職權正在增加，如果各省各地方職權一致是不必有，也是不可能的事，列強求一致，不但不能鞏固統一，反足以阻滯統一。所以今後各省各地的政制，應保留着若干限度以內的參差，所有的省及地方才可顧到地理及環境上的不同，而各自有充分發展的可能。

最關重要的問題，則為思想一致的問題。思想一致本與思想自由不相容。在思想自由的若干民主國家，人民的思想是極紛歧的。選舉佔多數的黨可以取得政權，但並不能禁止少數黨的思想自由，及由此而生的意見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德意等一黨獨裁國家，則獨裁的黨絕對禁人民發表立異的意見，甚且禁止人民懷着立異的思想。不但黨外如此，黨內也是如此。納粹黨及法西斯黨的少數有力份子可以包辦全體黨員的思想，全體黨員只能以領袖的思想為思想。

中國年來因急求統一之故也有思想一致的趨勢。當政者在年前頗努力於人民思想的一致。在各黨既公開活動，思想之是能一致，本應為人人共喻的常理，但事實上，欲使人民思想趨於一致者，與夫以齊一人民思想為要務者，蓋尚不限於一黨。

思想一致在事實上本是做不到的。以德國秉政者的嚴峻徹底，加以德人之富於服從，德國人民的思想亦尚未能一致。一旦秉政者去位，其思想的紛歧，識者預測將為世界各國之冠。至於中國人民則向來偏向自由，而較能有思想，較多發表意見的讀書人，更素來習慣於自由表示意見。言官制度之所以能為中國政治上最特殊最善良的一個傳統，士子士書當局之所以能成爲一種風氣，以及歷代學潮之所以時起

，均足以表示中國讀書人向來能自由表示意見，且喜自由表示意見。現在要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做應聲蟲，不許其自由思想，不許其自由發表意見，在事實上，是決難做到的。將來教育普及，民智愈發達，個個中國人，或差不多個個中國人，成爲讀書人，則困難自必更大。

若舍事實而言理論，而問應不應，則思想一致更不必提倡之事。思想自由爲自由中的最重要者。要各個人能取得自尊心，要各個人能得到人格上最高的發達，要民族的思想文化有久遠的進步，各個人的思想自由決不可少的。這是西方民主各國由經驗而得的真實。這也是中國人對於其固有文明可以得到安慰的一點。如果舊日言官敢言的精神及士子直言不阿的風氣，值得垂諸久遠，我們決不應忽略思想及意見自由。如果我們決計向民主的道路上邁進，我們更不應忽略這些自由。

若云思想的一致是方法，而國家民族的統一目的是目的，則以一致求統一不特是緣木以求魚，且將適得其反。如果一國的人民，都是沒有思想的，那也罷了；否則要人民思想一致，其結果必使有不同思想的人民，常與政府處於敵對的地位，而不僅處於責難的地位，因此發生

培植我們的經濟力

現代戰爭是兩個交戰國整個國力強弱的比較。所謂國力者，固然有一部分是指武力，如軍隊兵械等等，而尚有一部分是指武力以外的力量。國力強弱的比較，就是兩國全部武力和武力以外的力量總和的比較。只有武力，而沒有武力以外的力量，或是武力以外力量不如武力成就的大，則在戰爭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交戰力量將不決定于其武力的強大，而將受累于其武力以外力量的弱小。因爲在現代情形之下，武力以外的力量是武力的基礎。基礎若果崩潰則上面的建築自然不能凌虛存在。歐戰時候中歐諸國的失敗不由於武力的耗竭，而由於國內經濟的崩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叛亂或革命的行動，更因此陷國家於分裂。

中國現在亟須鞏固統一，即使沒有戰爭，這急需也極顯然的，是而說此刻尚須集中國力以抵抗侵略。但是，求思想的一致，決不是促進統一的方法。統一與一致決不是一件事；統一固然是要緊，但一致不是統一的基礎。凡是足以妨害統一的言行，政府本有予以防制消滅的義務。統一的言論，根本不在思想自由及意見自由的正當範圍以內，所以不能以自由爲憑藉，政府亦務須加以嚴厲的限制及取締。但政府如利用國家的權力來強迫人民具同一的思想，表同一的意見，則政府取締不正常思想意見的權利，在道義上便受了減損。不負責任的言論固有害於統一，強人民爲一致的言論也有害於統一。

現在中國統一的程度還不够高強，各方的團結尚不够精誠，互相消耗精力的地方還嫌太多，而求思想一致，以及其他方面一致的慾望則似又爲各方的通病。這種不健全的現象，倘在抗戰期中尚無澈底的糾正，則抗戰結束以後，將更無糾正的可能。我們對於完成統一的努力不敢後人，但我們以爲思想自由與意見自由也是真正統一的必要條件。

陳岱孫

推測中日兩國戰事的前途者也常說日本的失敗一定發端於國內。日本武力的成就遠過於武力以外的力量。只就武力而論，日本也許可以支持較爲長期的戰事。然而所以支持武力的力量，如經濟財政等，都未必有同樣持久力。一根鐵鍊堅韌的程度在於最弱之一環。經濟力就是日本整個國力最弱的一環。日本支持戰事的久暫，也就看這最弱一環能够支持到什麼時候。

我們的國策是長期抗戰。我們國力之不如我們的敵人，不庸諱言。我們想利用時間作我們的助力。以我們較小的力量來消耗敵人較大的力量，希望敵人國力練之最弱的一環有朝被拆，而敵人的武力也隨

之崩潰。事情是否如是簡單，是另一問題。不過我們既然以此測度敵人的力量。我們也應該同樣的估定我們自己情形。我們不但在武力上要以少耗大，在維持武力的經濟力上，我們也得給他們拚。在武力上，我們希望能夠繼續苦鬥，拉長抵抗的時間。在經濟力上，我們也得預備繼續努力，作武力的後盾。不要使得我們的經濟力也成我們國力線上最弱的一環。或者使得我們經濟力支持我們武力的力量遠弱於他們經濟力支持他們武力的力量。

經濟力，簡單的說，就是生產力，具體的說，就是一切生產機構的數量與其運用。一方面，她供給前線種種軍事上和給養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她維持後方人民的生活。在經濟學上，生產機構常被認為一種「財富」，而其所產生之結果為一種「所得」。「財富」普通都是認為「固定」的，而「所得」為「流動」的。經濟力，雖然具體的說，是生產機構。然而在另一意義上，經濟力不是一「固定」，而是一「流動」的。她本身在機構運用時，川流不息的消耗去，而於生產結果後也可以川流不息補充起來。這一面消耗一面補充就是經濟力本身消長的解釋。經濟力之為流動，不但是針對生產機構運用的結果，並且指明本身消長的可能。所以我們講到我們經濟力支持我們武力的力量，我們不但想到現有的生產機構，我們還要顧慮到經濟力本身的消長。我們於估計我們現有經濟力之餘，我們必需阻止一切足以消耗經濟力的行為，而鼓勵一切足以增長經濟力的行為。

我國富庶之區偏於東南及沿海各省。生產機構亦多集中於此，東南沿海各省淪陷，我們原有的經濟力因之大受減削。我們一切生產事業在戰前還在幼稚時代，經濟力本甚薄弱。經此打擊，喪失更不待言。然而抗戰國策既然必須貫徹，武力方面經滬甯徐州武漢的損失，方力謀補充，經濟力方面當然也應該努力培植，不能使整個國力中有一部分不能負起責任，而為抗戰前途之累。在戰爭時期，政府的設施，因為要應付急劇的局面，不能多所考慮，並且因為事變的艱巨，更不能大刀闊斧積極的執行，故其所產生的影響，也較為深鉅。處置得好，經濟力可以滋殖生長。處置得不好，經濟力便要因之消耗減少。

先就工業來說。富庶各省淪陷之後，大部分的工業都已消滅。工

業為現代戰爭的基礎，我們想繼續抗戰不能不努力於建設新工業，以應此時勢的需要。建設新工業有三件事可做。第一是鼓勵西南各省原有工業的發展。第二是鼓勵淪陷區域的資金的內移，及國外資金的吸收。第三則政府自身投資建設政府認為主要之工業。這三件事如果能逐漸推行，都做到相當成效，則向所認為貧瘠之區的各省分，未始不可變為工業相當發達的區域，至少希望可以勉強供應戰事最低的需要。尤其是第二點，吸收戰區及國外資金一項，我們知道在一部分戰區因為國際特殊的關係，並未大受物質上的破壞，因之能用在生產上的資力尚得保留。然與內地隔絕勢成孤島，銷路阻塞，此類資金難於利用。因此頗有想將此項資金用於內地者。政府若能與以鼓勵，吸收當亦甚易，獨是一般的鼓勵工業，還未必能充分的增加對於戰事有密切關係的經濟力。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切實與急迫的需要，定一個政策。我們儘管鼓勵內地各省的原有工業的發展，我們儘管努力吸引外資內移，我們儘管希望政府自身投資建設，然而無論在任何方面，我們都覺財力有限。要想以有限的財力得最大的用處，我們不能不慎密的揀選。關於這一點，我們當另外討論。此處所要指出的只是要增加經濟力不但要鼓勵工業，並且必需有一個政策與計劃，而此政策與計劃必需根據我們急迫的需要，與我們財力人力所可以勝任的。

其次銀行在內地的活動也應該推進行，就着發展時代需要的生產機構進行。戰區擴大之後，官私各銀行紛紛移入內地者甚多。然而除開少數例外外，大多數移入內地之分行，只是一個退步的地處，對於投資生產事業任務，似未積極進行。當然在銀行方面，這種情形自有其複雜理由。而從整個時局觀之，這種情形應該早日打破。如果在可能情形之下，各銀行能够組織一共同放款的機關，針對着一個有政策的經濟發展計劃，投資於某種類的工業，一方面可以輕減業務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可以顧慮各業發展的先後與投資的分配。在政府方面，更當與這類機關以充分的方便。這個辦法是否可行，各銀行自身當然可以決定，而投資政策之厘定推行為培植經濟力一個主要因素也是事無可疑的。

再其次，政府財政金融政策也應慎重考慮，切實避免剝喪生產力

量的設施，或引起金融上的恐慌，使國內經濟陷於停頓。今日財政的問題是軍費。軍費可簡單分為國外的付款，與國內的給養兩大項。國外付款一向為一大難題。我們過去所切望於歐美各國者，實為財政上之幫助。不幸過去期間歐美各國怯戰的心理阻止一切助我的表示。僅僅這幾天，還有英美兩國信用借款的消息。我們希望經過這一年半的考慮及經驗，歐美各國已經覺悟過去袖手政策的失敗，而至少在經濟上可以與我們以助力。退一步言，如果我們國外得不到信用借款，而我們必需向國外購買軍事必需的用品，那麼我們只好老實承認「一切外貨最終必須以土貨償還」的定理，於厘定我們工業政策的時候，特別注重發展能夠運銷國外市場的土貨。至於國內給養及其他支出的來源，也只有加稅與發行公債二途。飢不擇食，在此時，高談賦稅種種理論，固然是不切實際。然而一切不顧，一籌謀，也不是妥當的辦法。我們總希望稅的新負擔是多加在有錢的人，加在奢侈品上，而少加在貧人及生產事業上。如果是不可能的話，我們希望她不要重得使新舊事業負擔不起。至於直接或間接因為戰事獲得的收入或利得，和不用於做生產事業的產業及資本，這些東西就是加重稅率，也不至減少國內的經濟力，甚至也許可以壓迫不生產的產業與資本去做生產的工作，而增加我們的經濟力。當然願慮稍多的財政政策不會生產莫大的收效，不過我們根本懷疑在這一戰事中大一部分的戰費，能靠着賦稅的收入。

公債的來源有二個，一個是吸收人民的儲蓄，一個是由金融機關承受。前者是購買力的移轉，買公債者以其購買力獻與政府。銀行或其他代賣之機關，不過為中人。如此，則通貨不因公債發行而膨脹。後者為新購買力之製造。承受公債之金融機關，於承受公債之後，撥付政府以若干之信用。此項信用一由政府用於市場，即為新購買力之增加，而造成通貨膨脹的結果。我們過去公債的來源雖然有一部分是吸收人民的儲蓄。然而大部分還是歸政府各銀行所承受。通貨膨脹的結果當然是無可避免。各地物價的增漲，就是他的現象。不過情形並未嚴重，可以不必無謂恐慌。法幣推行的時間不長久，內地的通用，尚是最近一年來的事。這個新區域尚可以吸納若干的新通貨。然而我們

得承認這危險並不因之消滅。如果我們不預謀補救，一旦危險發生，我們生產力將大受打擊。因如一個慢性的通貨膨脹，固然可以與生產者以鼓勵，而急性的膨脹，反而破壞工商業通常的關係，增加企業者以業務以外的危險。這個危險我們的財政政策應該顧慮的。我們以為一方面公債的發行，務望其能儘量的吸收人民的儲蓄。在此範圍之外，方能由金融機關承受。另一方面，對外匯率須設法維持。我們現在其實不必維持舊法價，然而必須維持一個較穩定之匯價。幣值的變動，有時完全受心理的影響，國內一般人民對於法幣的信任，大部分是借鑑於外匯率的。外匯率劇烈的變動，很容易引起對於法幣的懷疑。如果懷疑的心理發展成為貨幣恐慌，那麼國內生產機構怕要因之脫節，而我們經濟力將受無謂的損失。

再其次，對外貿易必須調整。建設內地的經濟機構需用外來的工具機器，開闢內地事業的銷場，抵償必要的進口貨，維持匯率，需要大量的出口。政府以培植經濟力為前提，對於進出口貨的種類數量等等，應當有一個一定的政策。在進口方面，當然要鼓勵能增益各種生產的貨物，而在出口方面，必需禁止或限制與軍事有關或與我們自己生產事業有關貨物的輸出。這是原則。在決定原則的時候，政府不妨慎細將事，務使嚴密。而在既定原則之下，人民進出貿易當有相當之自由。政府為特種理由，可以獨占一切的對外貿易，則獨占貨物貿易以外貨物的流通，不但為事實上所允許，並且也間接的推動內地事業的發展。

以上所述，不過說明我們經濟力必須培植，而培植的途徑，上述政策是較為重要者。主於農業，固然也是主要生產事業。然而農業問題屬之技術者多，所以沒有討論。推行各項政策的責任大部分屬於政府。理論上，戰爭既然是整個國力的奮鬥，政府不但對於武力的支配運用要有計劃，對於全國經濟力的支配運用也應有一個計劃。事實上，我們政府也認明這個責任必須負起，對於主要的政策也已有初步的決定。雖然我們還要說的就是制裁經濟是一把雙鋒的利刃，兩面能割，我們希望用這支劍的時候，看明培植經濟力這個目標。

遠東之國際秩序

張忠絳

在歐戰期中，日本乘歐美各國無暇顧及遠東之時，以非法手段，盡力擴充日本在中國之地位與勢力。先則提出二十一條，以哀的美敦書之方式，強迫中國接受。繼則以西原借款，與政治，經濟，軍事各種協定，以威脅利誘之手段，使中國方面簽訂。

日本之此種辦法，一方面固危及中國之獨立與生存，而他方面亦危及歐美各國在華之均勢與利益。大戰既終，中國固極欲對過去日本以非法手段造成之局勢，謀合理之解決，即英美等國亦極願予遠東問題以合理之解決，重新建立遠東之秩序，奠定太平洋上和平之基礎。因是而有華盛頓會議之召集。

華盛頓會議之結果，一方由太平洋上列強簽訂海軍之比率，規定各國在太平洋上之防禦範圍，取消英日盟約，而代以英美日法四國所簽之協定；一方由與會各國簽訂九國公約，并作成對華問題之種種決議案，俾得次第付諸實施。

華盛頓會議中所簽訂之各種規約，其對象與內容雖極複雜；但其精神則始終一貫，異途同歸，即對過去遠東問題予以合理之解決，重新建立遠東之秩序，奠定太平洋上和平之基礎。為奠定太平洋上和平之基礎，故不得不規定太平洋上列強海軍之比率，各國在太平洋上之防禦範圍，并取消英日盟約，而代以英美日法四國所簽之協定。但欲奠定太平洋上和平之基礎，使列強均願簽訂五強海軍協定與四強公約，則華會必須同時對過去遠東問題予以合理之解決，并重新建立遠東之秩序；因是而有九國公約及對華問題種種決議案之簽訂與成立。

九國公約第一條之規定為：「除中國外，各國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二）給與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并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

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并不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此為全部九國公約及華會中對華問題種種決議案之精義。此種精義之要點如下：

（一）為避免各國在華權利之衝突，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原則，各國必須遵守，必須予以維持，務使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得享有公允之待遇。在積極方面，各國應施用其權勢，以切實設立并維持此業經公認之原則。在消極方面，各國應自行聲明，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他國人民之權利，并危害友邦之安全。

（二）為維持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原則，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必須不被侵犯。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如被侵犯，則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原則必遭破壞，門戶開放政策，在實際上，決無法實行。因此而各國自願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

（三）為保全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中國必須有一有力鞏固之政府。根據中國過去之歷史，及中國人在歷史上所表現之政治天才，中國人若獲得無礙之機會必能於短期內自行樹立一強有力之政府，以適應此新時代之環境。因此而各國自動聲明：「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

換言之，華會各國當日對遠東問題之認識如下：

（一）中國必須有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中國人若能獲得無礙之機會，則中國人自能樹立此種政府。

（二）中國若有一有力鞏固之政府，而後中國始能保全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中國若能保全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而後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原則始能維持。中國境內之門戶開放原則若能維持，而後遠東之國際秩序始得樹立，太平洋上和平

之基礎方可奠定。

(三) 整個太平洋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若能獲得合理之解決，太平洋上始得太平。

上述為華會各國當日對於遠東問題之認識。此種認識既正確，而又公允。此種認識為華會建立遠東與太平洋上秩序之基礎。華會中所簽訂之各約章，均以此為其核心。

華會中各約章簽訂之後，遠東之國際秩序因之恢復，太平洋上之風雲因之消散。華會閉幕後將近十年之內，太平洋上風平浪靜，遠東各國間之關係極為良好。倘再稍假時日，則遠東永久之和平必可樹立。不謂日閥包藏禍心，竟於中國行將完成統一建國大業，并獲得一有力鞏固政府之時，撕毀約章，以武力侵佔中國領土，推翻華會所建立

論導師制

馮友蘭

我沒有學過教育學，沒有辦過中小學，所以對於中小學教育完全是外行。本篇論導師制是就大學教育說。這是要先請讀者注意底。

導師制是一箇西洋底名詞。推崇此制者，多引英國的牛津劍橋二大學為例。我們先說牛津劍橋二大學的導師制的來源。我們設想，在北平的西山，某皇帝，在某處設了一個禪院，裏面有一處僧寮，一座佛殿，一座經樓，一座齋堂。然後再招了許多僧衆住在僧寮。修行。佛殿供他們拜佛，經樓供他們念經，齋堂供他們吃飯。另外有一個貴妃，在附近底地方，也修了一個禪院，其中布置，大略相同，也有許多僧衆在內。以後大臣，太監，都照樣在附近設些禪院。如是西山某處，有了許多底禪院。他們的內容，及性質，大都相同，但是各自獨立。我們再設想西山這些禪院，常常合請外處的高僧來長期「說法」，名院的僧衆都去聽，或合請這些禪院中的僧衆之有名望者長期「說法」。各院的僧衆都去聽。這樣久了，各禪院即於牠們之上，設一箇總辦這些諸人「說法」之機關。由這機關從別處或各禪院聘請固定「說法」底人。後來這些「說法」底人，不止說佛經，而並且講別底學問。因

遠東之秩序，致有今日中日兩國間之戰事，列強與日本間之衝突，以及太平洋上海軍之競爭。

遠東與太平洋上之秩序遲早終須恢復；但遠東與太平洋上合理之秩序，仍須樹立於公允合理原則之上。而公允合理之原則，固仍不能脫離華會當日之認識，與九國公約所規定之原則。今日而言建立遠東之「新秩序」，其唯一之方法為恢復華會所樹立之秩序。日本今日方聲言欲建立遠東之「新秩序」。但離開華會所樹立之秩序，太平洋上別無秩序可言。日本一日不認識此點，太平洋上的秩序，無論新舊，亦一日沒有希望。太平洋上之列強，能早日促醒日本，使日本停止擾亂并破壞華府所建立之秩序，則太平洋上之秩序亦即能早日恢復。

為亦講別底學問。「俗人」子弟亦來上學聽講。這些俗人子弟分住在各禪院內，受各禪院的高僧指導管轄。這樣即有許多人在西山，修行，講學，上學，於是西山便成一個文化中心了。如此等文化中心，稱為大學，則我們便可名此為西山大學。牛津劍橋大學的各院原來即是這些禪院一類底機關。牛津劍橋大學各院的「學侶」，即是在這些禪院裏修行底一類底人物。牛津劍橋大學，即是這些禪院之上底公共機關。牛津劍橋大學的教授講師等，即是這公共機關所請底「說法」人。牛津劍橋大學底學生，即是來上學底「俗人」子弟。牛津劍橋這一類底大學，與中國原有底書院，都與宗教有關。分別是：這一類底大學是直接從宗教機關演變出來底，而中國的書院，則是從當時底宗教機關做來底。

牛津劍橋的導師制，是這樣底形成底。這樣底導師制是不易學亦是不必學底。為什麼是不易學？因為牛津劍橋的各院的學侶，本來都是各院自家有底，在替他們本來除修行外無他事，現在除研究外無他事，他們的數目，本來相當底多。所以各院將那些「俗人」子弟，分配

幾個在他們每一人的名下，讓他們常常約他們來談，問他們聽講演講，不懂，在這裏住有沒有困難；這並不十分耽誤他們的修行或研究的時間。但是在沒有牛津劍橋的歷史底大學中，那裏來這些『學侶』？若竟要經費，也聘這些『學侶』，固亦可行，若此而辦不利，只把這些工作，硬加在已有底教員的身上，這些教員，恐怕亦只得奉行故事而已。英國美國新興底大學，不學牛津劍橋者，經費不足是一原因。

爲什麼又是『不必學』？這又從兩方面說。先從學生的知識獲得一方面說，學生聽了教授講演以後，還有人再幫助溫習，當然對於學生是很有益底。我們知道，有許多富家，一面送了弟上小學，一面家裏請先生。學生下課回來，家裏先生再幫他溫課，叫他誦補充底書籍。這當然對於學生是有益底。然亦不見得不如此，學生即必不能有很好底成績。就小學學生說，已是如此。就大學學生說，這種幫助，似乎更不是必需底。在一般學校中，學生如果不是十分地不行，如果不是十分地不用心，教員所講總不至於跟不上，即有不懂，而問難的機會，在一般情形中，總是有底。

就學生的行爲一方面說，在行導師制度學校內似乎對於學生的行爲或所謂『做人』者有所指導。推崇導師制者，大概都洋意在這一方面。不過在這一方面，事情亦不如是簡單。

『做人』是一個比較形式底名詞。什麼是『做人』？怎麼纔算『做人』？不是很容易說底。原來牛津劍橋的『學侶』，以及我們從前書院的『山長』，私塾的先生，教人『做人』，是比較容易底。因爲在那些時候，人的一舉一動，都有一定底規矩，寫在『聖經賢傳』上，導師可據

以指導學生。但在我們現在底時候，這些一定底規矩是沒有底。無所依傍而指導人『做人』，並不是一件容易底事情。

在現代式學校裏，尤其是大學裏學問分工，極其細微，一個教授，可只對於他所專長底那一點有深刻底研究，在別的方面，他可以所知很少。有人說：所謂專家者，即對於很少底東西所知很多。一個專家，除了他所專長外，在人情日用常識方面，可以比他的學生所知還少。有一位在德國的學生前年告訴我，說他的教授會問他，中國的皇帝，現在好不好。這位教授對於現代政治底知識固然隨得可以，但這不是爲奇底。他的學生要跟他學底，是他所專長底那一點，並不是現代政治。

以牛津劍橋的導師說，他們的地位，似乎已非昔比了。因爲學生人數的增加，每導師所指導底人，有五六十人之多。每一個學生，在一個星期內，亦不過能與他的導師接談一兩個鐘頭。教師所談底大概亦是關於知識底問題居多。因爲現在各種政治上社會上底問題太複雜，而這些問題，都與學生的現在或將來底行爲有關。對於這些問題不能與學生以滿意底解答，而欲指導其行爲，是很困難底。但解答這些問題，又非每一個担任導師底人所皆能。如上所說底德國某教授，若談到政治問題，大概他的學生可以比他知道得多。他如何能在這方面，指導他的學生，作他的導師？

至於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學生在道德方面，得到好底影響，我於新事論中，另有詳論。現在所可說者，即教育當局現所擬推行底導師制，在大學教育中，大概不容易有成效底。

河北省內的抗戰概況

唐士

河北省沿鐵路的城市，約一年以前，已經被敵軍完全佔了。不近鐵路的內地區域，雖有時受日軍的短期蹂躪，在這一年內，却是在逐漸組織起來，到現在可算是已具規模。河北省內現在有三個內地區域。一個可稱爲冀西區；牠包括平漢路以西的山地。阜平是這個區域

的政治及軍事中心，也就是第八路軍所組織的冀察綏邊區政府的所在地。邊區政府約在去年年底成立。冀西區據有西通五台的路線，形勢非常險要。今年十月內阜平會一度被敵軍侵入，但在十月底左右又被吾軍克復了。

第二個內地區域可稱為冀中區。牠的領土在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平津路以南，滄石路線以北，約共二十五個縣。這個區域的領袖呂正操將軍原來是葛福麟部下的一個團長。葛氏率領他的部屬總退却時，這位將軍沒有退，仍舊帶了他的部下與敵人周旋于冀中平原；幾個月後，他的原有部下只剩了五六百人；但那時敵人已疲乏了，不得不退出冀中；於是呂將軍得了機會，將冀中區域重新組織起來。那裏原有張蔭梧所訓練的民團，就應召出來，組成抗日部隊。又加以民衆訓練，於是抗日實力益增。結果是冀中區的現有部隊已約十萬人。冀中區政治組織的完成約在今年二三月間。至約六月底時，呂將軍受命爲第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官。至約九月底時，中央所任命的河北省新主席鹿鍾麟方到冀中。鹿主席帶到冀中的部屬聽說約有二萬餘人，作者于十月初離開平津，以後的情形還沒有知道。九月底左右作者曾聽說鹿主席希望呂氏到冀東去發展。換句話說，就是希望呂氏讓出他所堅苦地創造出來的局面。大約到十月底左右呂氏還沒有照這個意思去辦。鹿氏是中央任命的省主席，他的意見是應當尊重的；但太不考慮到實在情形的辦法，恐怕在事實上頭難以實行。已成的政治局面，新主席終得與以現實上的考慮。在全國抗戰時期，須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凡是確在做抗戰工作的人，大家都應鼓勵他們，支持他們。

在冀中區的軍隊約有十萬，據說槍枝亦有此數。區內有一小兵工廠，能修理及製造普通的槍，能做手榴彈及燃燒彈。區內所最感缺乏的是猛烈的炸藥。爲阻礙敵人前進起見，區內與區外間的公路交通已經割斷。九月中敵人有進攻冀中區的模樣，所以區中決定了拆城的政策。城牆拆去後可免除敵人據守不得已而淪陷的城。在游擊戰術上，進退得失是常有的事。倘失去的城尚有城牆在，敵人就極易用少數兵隊去據守牠，吾軍就不易恢復這地方了。九月下旬高陽的城牆在被拆下時，敵人的飛機曾到高陽投彈兩次。損失雖不大，這是敵人進攻高陽的預兆。以後的詳情不得而知，但據十月底區中友人來信，敵人進攻高陽的計劃已失敗了。天津附近的勝方霸縣地方是第二條進攻冀中的路。據報載十一月中旬敵人在勝方附近進攻。平津鐵路房車站附

近的安次縣是第三條進攻冀中的路線。這個縣城在本年內已經遭遇到幾度的淪陷與恢復了。

冀中區內准許流行中交三行的鈔票，河北省銀行的舊票及冀察綏邊區銀行所發出的新票。北平偽政府所發出的準備銀行鈔票絕對不准使用。區中的貨幣政策是拿邊區銀行的新票來收回三行鈔票及河北省銀行舊票。換句話說，就是拿法幣做新票的擔保品。有時區內的愛國商人到偽政府境內收賬，收到了偽幣，替區政府買些必需品，設法運到內地去，區政府就拿區內能用的鈔票還給那商人。區內的財源當然很缺乏，所以餉薪也就極小，除供給衣食住外，只發每個兵月餉一元，每個文武官吏月薪八元。技術人員則待遇較高，得月薪十元。新到區內的普通人員，必須受過一兩月訓練後，方能派給職務。技術人員，則因需要的迫切，無須受訓。

冀中區是一片大平原，只出農產物，幾乎完全沒有出礦產，不能算作經濟力特別豐富的區域。今年的麥類收成甚好；因禁止糧食運出區外的關係，據說存糧可够兩年之用。棉花原爲該區的重要輸出品。因輸出後不免爲敵人所利用，故棉花的種植已經區政府限制；只種相當畝數，使民衣無憂，高陽原有著名的織布手工業，所以區中的軍裝及民衣勉強可以自給。

冀中區內有平津各大學的學生畢業生及教職員數十人在那裏工作。有兩位英國的經濟學家曾經到過區內兩次，貢獻些有價值的經濟政策。有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亨生 (Hanson) 也曾到過區內兩次；他的報告的內容曾登載于六月初平津泰晤士報兩日的社論中；他另有篇記載，發表于本年八月份美國的亞洲雜誌 (Asia)。

冀中區至今還急需技術人才去參加工作，尤其是能做炸藥的化學者，能在內地興辦小工業的化學者及工程師，兵工技師，無綫電技師，各種機匠，醫生，看護士，能管理銀行的專家，及能計劃如何管制輸出與輸入的專家。有志參加這些工作者可無須顧慮到旅途的艱難。據作者所知，到冀中去的旅途上實在沒有多大危險。

第三個內地區域可稱為冀南區。牠的領土在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滄石路線以南。這個區域內的多數抗日部隊，聽說也屬於等八

路軍。政治組織也受該軍幹部的指導。照地理上看來，冀中與冀南兩區域，中間沒有鐵路隔開牠們，應該可以合成一起。不知道爲什麼沒有合起來；也許是因爲太大的區域不便于管理的緣故。兩區域間意見隔開的地方却是沒有。

我們希望冀東區可不久組織成第四個內地區域。第八路軍于七八月間攻入冀東，轉戰十餘縣，時常將天津山海關間的鐵路割斷。但是在十月初冀東區仍在混亂狀態中，還沒有產生能維持治安的政治組織。

上面的四個區域中，冀西冀東的形勢較冀中冀南爲重要，所以敵人的計劃大約將先攻東西兩區而後及于中南兩區。做沿鐵路游擊工作的部隊，除了從內地區域派出來的軍隊外，還有許多他種游擊隊。他們並非從內地區域派出。他們的組織及名稱，不免紛歧。有確可欽佩的志士所自動組織的，例如在平西門頭溝持久抗敵的趙個部隊，有

文藝與經驗

葉公超

現階段的文藝應該走上那幾條，或那一條途徑絕不是個人的意旨所能計劃的。時代的環境與作者的心靈自有它們交接推動的趨向。的確在文藝受統制的國家裏，黨國的威政也做到了把多數成績較好就作家排斥到國外去流浪，剩下一些糟粕在推行着奉公守法的文藝。在文藝裏，獨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爲文藝是一種自由發展的東西，一種知覺與靈感所到的藝術表現；不給它感覺的自由便沒有它的存在與發展了。所以，對於文藝，我們只可以批評它的意識不夠廣大，靈感不夠豐富，而不能加以任何限制；統制自然更談不到。

前六七年，一個通曉漢文的德國朋友對我說：「你們的新小說多半好像是學生的作品。」我問他都看過些什麼，於是才發現他看過的至少比我多幾部。他舉出幾種長篇和短篇的作品來做例證，後來又提出他認爲較好的幾部來討論。我聽了他的話，並不詫異，原來我個人亦似有類似的感覺，只是我的感覺不如他的來得這樣簡單；我運想到

中央直轄的人員所組織的，例如忠義救國軍；有大地主所組織的連莊自衛軍；也有久雖行伍的軍官所臨時招募而成，以備新主席給以名義的部隊。這些游擊隊間有時不免小衝突。幾部份忠義救國軍曾被冀中區軍隊繳械。冀中區內的人說：被繳械的或是從土匪出身紀律不良，或是犯了輸誠于敵的罪。忠義救國軍方面，對於後者，說明如下：有時用輸誠于敵做一種策略，目的在取得敵人的軍械。照道理說，用此種策略時，倘沒有預先通知共同抗敵的部隊，實難怪他人發生誤解。倘事先通知，則又未免有事機不密的危險。很希望鹿主席能設法消滅這種誤解，預防這種危險。

鹿主席的重大任務就是要統一游擊隊的指揮，要設法避免不須要的自己間的小衝突。但是這個目標不是全靠軍事人才所能解決的；鹿主席似應有幾位有新式訓練，有遠大眼光的幕僚。

活的語言還未曾走到舞台上的事實，我運想到我們周圍一切逼人注意的現象——一個支配了我們生活幾千年的家族制度在崩潰，一個農業國家失掉了本位的農村，一個滿身二十世紀消耗習慣的統治階級爲一個十八世紀生產力的民族諷衣食——這些還都未走進我們的文藝，至少還未得着充分與適當的表現。多半小說的公式還是戀愛——電影——戀——革命。社會的一切不斷的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的意識却只達到了自己的感傷與怨恨。許多作家好像是常年養在孵卵器中的動物。這只是大學生四年的專利，不是創作者的樂園。小說是最含有社會性的東西——直接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間接表現一種生活的背景。詩人，尤其是抒情派的詩人，可以耽溺於內向的情感中，但是小說家的知覺是要向外伸張的。

就是拿我們的新詩來看，我個人也感覺大部分作品還是情調過於單調。這二十來年，新詩的成功多半是在抒情詩方面。抒情詩是樂歌

脫胎，是建立於文字的歌唱性上的。但是詩至少應當有兩種：一種是運用語言的歌唱素質的，一種是運用說話的節奏的。前者是抒情詩的範圍，後者是描寫與敘事詩的工具。我並不主張放棄了抒情詩來寫史詩——我自己是最愛讀抒情詩的人——我只指出這個缺點來證實我們文學意識是過於狹隘了。為什麼抒情詩在數量與質素兩方面都不優勝？我想最大的原因是我們的詩人的年齡與經驗都是偏於抒情感方面的；他們的路線大多是從書裏走到自己的小小悲哀上，或再走回到書裏。除了這個理由之外，還有舊詩的傳統影響和早期新詩收穫的影響，不過這兩點恐怕都是次要的。詩與語言的關係大致是詩來挾語言，不是語言來挾詩；換言之，即以詩來求語言的節奏，而不是以語言來求詩意。我要避免這個誤會。但是假使一味求文字音節之悅耳，而不顧到語言的本質與屈撓性，那又何必要用白話做詩呢？僅以格律與音節而論本，舊詩之外實在可以無需再要別的詩。回到本題上來，新詩人之所以沒有說話的節奏上探索的原因也是因為他們的經驗是只限於抒情方面的。

有人說過，代表一個時代的知覺與靈感的，就是那時代的文藝；文藝無需故意跟着時代跑，時代却自然會在偉大的作品中流露出來。這話和「文學是宣傳的武器」的口號根本不同。一個作家的生活和其他的人一樣至少是關係兩方面的，一是意識或知的範圍，一是靈感的深刻程度。知覺範圍之大小就是一個人對於環境的事實認識多少；所謂靈感之深刻程度，就是對於環境各種現象的意義的了解，以及了

新語言

新文學運動的提倡者胡適之先生覺得我們的國語太貧弱了，曾經提出「文學的國語」的口號；這是和「國語的文學」的口號聯帶着提出的。「國語的文學」是對古文學說的，一般的看法，和「白話文學」或「新文學」意義一樣。在這個意義下的「國語的文學」，現在可以說是成立了；有人覺得「國語的文學」現在已不必叫作「新文學」，

解後的感悟。作者如能與環境中各種事實直接接觸，自然理想的機會，否則也可以間接的求得相當的認識，所以文學作品裏的經驗未必都是作者自己經過的事。這種探索事實的習慣不是人人有的，也不是短期間就可以造成，而是要做作家的人則非有不可。進一步說，僅僅認識了事實還是不夠，主要的還是要能了解事實彼此的關係，並且對於這些關係產生一種態度與感悟。

抗戰以前多數的作家都住在沿海幾個都市裏，現在他們大都轉移到內地來了。這次抗戰的經過，總應當有許多可以留作將來回味的材料。內地一切情況也應當可以給他們不少的刺激，使他們產生不少的感悟。這裏們我可以看到我們實在的經濟階段，我們整個文化的落後，我們民族性的優點與弱點。經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期，我們一般作家的意識應當擴大了，他們的靈感也應當比從前豐富了。我們當然不能希望馬上就有作品出來，一個偉大時代的表現往往是要等數十年的，不過我們只希望一般作者要在這個時期裏把他們知覺的天線樹立起來，接收着這全民抗戰中的一切。最近百年來西洋文學裏最重要的趨勢就是擴大了文學裏的社會性，雖然一方面有純詩運動，有極端個性的嘗試，多半的作品仍然還是根據各種社會現象來表現人生的。我們的文藝似乎也向着這個方向走，不過以各方面看，我們作家們的經驗實在太單調，太狹隘了。目前這個時代正在促進我們一切的努力，我們希望，從事文藝的人也在同樣的開發一個新時期。

朱自清

應該叫作「現代中國文學」或「現代文學」了。這個意見很對，相信可以得到公認。但那「文學的國語」却似乎還在爭辯之中，沒有穩定的地位。固然，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語言百分之九十幾是所謂歐化的語言；現代中國文學如果已經被公認，那種所謂歐化的語言似乎也該隨同着公認。可是這裏面還有複雜的情形。第一，現代中國文藝

所以可能被公認，只因爲它是白話的；但那種白話够「白」不够「白」，意見便不一樣。第二，文學裏的白話不能，該不該，被認爲一般的國語，意見也許更多。所以我們還只能很謹慎的稱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白話爲「新語言」，正和白話文學初期我們我們只敢，只能，稱它爲「新文學」一樣。但相信這種「新語言」會逐漸得着它的國語或「文學的國語」的地位的。

第一個創造這種新語言的，我們該推周啓明先生。他提倡「直譯」；在他的第一部翻譯的短篇小說集「點滴」的序裏，他說，譯本「應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他的譯筆雖然「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可是能够表達現代人的感情思想，而又不超出中國語言的消化力或容受量。雖然「不像中」，可是合式。他的這種新語言或新文體，對於後來執筆寫作的人，可以說是有意無意的影響。但他主張的「直譯」，在後來的翻譯界的影響却很大；許多幼稚的譯者只抱着「逐字譯」「逐句譯」的話，結果真成了所謂「硬譯」「死譯」。關於這種新語言的討論，新文學運動以來，是隨時有的。但有三次更其認真些。第一次記得是在民國七年，小說月報的編者沈雁冰先生提出「歐化」問題，請讀者討論。參加的似乎不少。結論大約是「歐化不妨，歐化過度却不好」。這個「度」就是上文所謂「合式」；這是不能用數量規定的，只好用「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所公認的」一個寬泛的標準。第二次是大眾語的討論。這裏面有政治背景，不全站在語言的立場上。主張大眾語的人，主張用「農工大衆的用語」；他們攻擊「歐化的紳士的語言」。不幸的是，這些人在討論的時候，還用着那「歐化的紳士的語言」。提出大眾語這問題的宋揚（瞿秋白）先生並且指出現在小學教科書裏也用着「歐化的」語言。他痛恨這種現象，但他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的存在。這見出所謂歐化的語言的影響是多麼大。這回討論，後來移轉論點到拉丁化問題上。拉丁化似乎已有相當的影響，可惜不知其詳。至於用漢字表現的語言，是始終在「歐化」着。第三次是語錄體的討論。主張的人是林語堂先生和他的信徒。他們似乎覺得所謂歐化的語言不如口語夾文言來得親切自在。但這個討論不久就過去了，語錄體並沒有復活的徵兆；用它的怕只剩了林先

生一個人。

這裏所謂歐化，似乎專指，至少偏重，中國語言採用歐洲語，特別是英語，的文法而言。但歐化的意義不止於在文法上。陳西滢先生批評徐志摩先生的詩文，說他的歐化不是平常的歐化，他的字都在紙上活躍着。陳先生所指的大約是徐先生許多新鮮活潑的隱喻。但徐先生並且能够支持他的想像力，不粘着在一時一地一個人的狹窄的實生活上，構成他理想中的樓閣，如「死城」那篇散文便是的。這是新的思想樣式或感覺樣式，也是「歐化的」。在這兩方面「歐化」我們的語言的，徐先生是第一該推薦的人。此外，還有辭彙的「歐化」，這裏我只想舉出創造社幾位作家。他們那時愛用歐洲神話和歷史裏的典故，胡適之先生曾指爲「新典主義」；又愛用科學名詞。「新典主義」似乎無人承認，但科學名詞，寫作的人愛用的像是不少。這三種「歐化」，並不只是好奇，爲「歐化」而「歐化」；這些都是現代生活反映在語言裏，都是不得不然。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國家在現代化，我們的軍隊在現代化；誰都覺得這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得不然的。語言的「歐化」，在適應和發展現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只看上文所述第二次第三次的討論，特別是第二次大眾語的討論，力量相當雄厚，都不能抵抗那個「歐化」的潮流，便明白了。便是拉丁化運動，至多也只在初期能够多少避免「歐化」，萬一真個普遍化，連受過高級教育的人都用的話，那也是一定要「歐化」的，不過方式也許不全和現在進行的一樣。所以語言的「歐化」實在該稱爲語言的現代化，那才名實相副呢。

上文所舉出的語言的四種現代化，末一種反映着科學的發展，工業的發展。中間兩種反映着個人主義的發展；不甘受傳統的限制和束縛，自己去開闢新世界。我們的文藝史裏，有所謂「正」和「變」；那個「變」也是開闢新世界，不過因爲社會的變是漸漸的，是小小的，所開闢的新世界也就不大。這回可不然了。我們接觸了工業的文化，社會情形差不多來了個劇烈的突變，語言也便來了個突變，和傳統比着看，似乎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和現代生活對照，這却是合式的。那第一種文法的現代化，其實說說，文法的部分的現代化，反映着分析的精

神的發展。日本谷崎潤一郎寫過一部「文章讀本」，也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他們語言的發展和我們的有同樣的情形。谷崎反對「歐化」，提倡所謂「和文調」。(一六二—一三三)但他明白「歐化」的語言是確切鮮明的表現。(一六二—一三三)日本語是不適於記述西洋輸入的科學哲學法律等學問的。(七二面)他也明白現在學生，雖小學的幼童，也用科學方法教育；他們的頭腦已習於演繹歸納，所以教語言，非教分析的文法不可。(八三—一四四)他並且承認，在初學的人，將日本語照西洋式結構，也許容易記些。(九一面)中國語言的情形正是一樣。宋陽先生攻擊小學教科書用「歐化的」語言；我們看了谷崎的話，便知那是不得不然。

谷崎爲籠統的語言辯護，舉李白「靜夜思」爲例。李詩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見明月，低頭思故鄉。」他說這篇詩所以能有悠久的生命，能訴諸任何時代任何人的心，原因固然很多，而沒有主詞，動詞不表示時間，這兩件事關係最大。若在西洋詩，「舉」一舉「思」等動詞，必須加上主詞「我」，「牀」頭「故鄉」等名詞上，也必須加「我的」；而那幾個動詞也許得用過去式。這樣，這篇詩便只限於一人一晚所見所感，力量就差得多了。(二七五—一七面)又說有個俄國人要論他的劇本叫作「要是真愛的話」，覺得這題目很難翻：到底誰愛呢？是「我」？是「她」？是「世間一般人」？要而言之，這個句子的主詞是誰？谷崎告訴他說，按戲講，主詞可以說成「我」；可是按理說，限定愛者是「我」，意味未免狹窄些。既然是「我」，同時是「她」，是「世間一般人」，是別的任何人都行；這樣，氣象就廣闊。儘量模糊，於具體的半面中含有一般性；關於特別的事物的話，可以有格言和諺語之廣之重之深；要是可能，翻成俄語，也還是不用主詞的好。(二七四—一五面)谷崎的話很巧妙，但細按起來，實在似是而非。中國古詩和西洋詩的不同，決不僅僅在文法上；兩者之中，思想和感覺的樣式相差是很遠的。西洋也有「能訴諸任何時代任何人的心」的詩，句子有主詞，動詞表示時間，這兩件事不妨礙它是好詩。詩本不是分析的；中西詩的相異決不在籠統與分析上。谷崎可以說是無的放矢。這是一。至於他那個劇本的題目，似乎還是有主詞的好。劇本到底不

詩，不妨「模糊」些，不妨含蓄些，劇本，一般的劇本，反正要說得够清楚的，裝上個詩味的題目，叫人天涯地角的去想，真是多餘。譬如他這劇本「要是真愛的話」，看題目時固然可以想着誰愛誰，但一讀劇本，知道是「我」愛，那题目的詩味便失去了。在詩裏却不同。「模糊」就「模糊」下去，含蓄就含蓄下去，詩人不會將謎底子給你着，你可以老涵涵着那詩味。所以谷崎可以說是在隨事增華；這是二。况且文法的現代化，對於一般的語言該比對於文學裏語言重要得多，谷崎只就文學立論，也不免是一偏之見。

我國反對語言現代化，特別是文法的現代化的人，大約都着重在一般人難懂這一點上。胡適之先生如此，大眾語論者也如此。只有語錄派才從親切自在着眼。胡先生所提出的「文學的國語」，大約是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加上官話，加上西洋文學的意境的東西。他很注重明白，易懂，認爲文學三性之二；但沒有說明該教那些人明白易懂。他最反對所謂象徵詩派的新詩，說是大學教授的他都不懂，只能算是「笨謎」罷了。詩是最精的語言，固然要受過好的語言訓練，也要性情相近的人才能懂，倒不一定大學教授。懂詩的人比懂散文的要少得多。胡先生却賞識周啓明先生的小品散文，那是多少在用着現代化的文法的。他又很注重句子的主詞；在獨立評論八—三號(二四，一二，二九)「再論學生運動」一文裏，他引大公報的短評說，「凡中國人而有天良者，對於學生只有感動與悲愧，但不能不勸告『他們』從速復課。……請願的目的爲擁護國權。政府已接受了，表明正在努力。那麼，『他們』只有一面監視着政府，一面上課。」這裏兩個「他們」是胡先生給補充的。句子必有主詞才清楚，正是文法現代化的一件。可見得除某些詩外，胡先生對於文法現代化，是相當的寬容的！而且他有時候覺得這樣辦倒可以使文字清楚些。他是一個提倡分析的人，所以能够如此。

大眾語論者攻擊語言的現代化，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現在頗有些人看不起民間故事以及說書先生的表現方式，以爲這是平易庸俗。他們務求新奇，竭力摹仿着西洋的一些徒有「形式」的作家；結果是使讀者大受驚嚇，大受驚嚇。但連結而後成爲一篇的時候便成爲大眾所不懂的怪天書了。『大』一『聲』這表現的「方式」大眾所不懂的，然而倘以爲平易庸俗而改爲「大聲地叫着」，那麼即使大眾能懂，可是所給與的印象就差得多了。……(格，一懂)

